

孙中山史事详录

1911—1913

王耿雄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1091623

孙中山史事详录

王耿雄 编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75印张 6插页 458千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平1—1,600
精1—800

统一书号：11072·195

定价：平 4.55 元
精 5.85 元

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（1911—1913）

序 言

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次腾飞。它推翻了二千余年的封建帝制，建立了民主共和国，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一大步。而孙中山的名字是与这一伟大变革共存的。鲁迅曾经说：“只要先前未有的中华民国存在，就是它的丰碑，就是他的纪念。”这是就武昌起义后建立民国而言，以后的“民国”却不是孙中山所愿意看到的了。

孙中山从革命中来，在革命中去，他的一生是一个整体。我们既要从整体来认识他，也要分阶段来研究他。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重要的里程碑，又是孙中山大半生奋斗的业绩所在。七十余年来，无论作为近代史和孙中山的整体或阶段，都有过无数记载和评论；近年，国内外且出了许多专著，论文更为旺盛，表现了人们对一代伟大人物的缅怀，对伟大历史事业的尊重。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这个巨大课题，在中国历史上是古今中外的汇合点，许多事需要进一步排比探讨，阐幽抉微，溯往知来。王耿雄同志的《孙中山史事详录》（1911—1913），正是基于这种要求而发奋编著的。

王耿雄同志是一位在上海从事印染设计的工程师。早在

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的战火中，他十五岁时读了一本演述孙中山革命故事的书，被书中的情节感动，对孙中山油然而敬慕，开始注意孙中山的图片及有关文献资料，渐渐成为业余爱好，想编一本孙中山画传。于是，经常出入旧书店、旧书摊，不管是单幅还是一本书，不管是个人照片还是集体照片，只要有孙中山在内，能买得起的都买来；凡从图书馆、纪念馆和私人手中看到的，就借来复制，数十年来，乐此不疲。迄上海解放初期，他积藏的孙中山图片、墨迹、文件等资料，不下于三百件，现已增至近千件，有的是失传的独照孤本。自1956年起，他先后为历史纪念馆、展览会及有关著作提供的孙中山珍贵图片、文献资料一百数十件，丰富了这些纪念馆和展览会的内容。并经常被谘询，又常为图片、文件的年月及其他疑难进行考订、解说，有时写成专文，多次得到报刊的好评。

因此，王耿雄同志对孙中山的认识和研究，不只是以记述文字为依据，主要是通过一幅幅图片、一件件墨迹、文件的时间、地点、背景，从早年到晚年把它们连缀起来，得出孙中山的伟大形象，显示了“画像”风格的研究途径。

目前呈现在读者前的这部《史事详录》不是孙中山的一生，只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始于1911年10月武昌起义，终于1913年第二次革命后的12月，为时27个月，即辛亥革命胜利和失败的阶段，有其光辉的战斗历程。但限于成本，未能大量揭载图片，只选了二十余幅有代表性的刊出。这本书之所以称为“详录”，从它收录的面和数据足以说明：

一、全书共收录了一千二百余条，比1980年出版的《孙中山年谱》在同一时期内的三百零八条，多九百余条；比台湾出版的《国父全集》和北京正在陆续印行的《孙中山全集》，在

同一时期内多收佚文一百二十余题。截至目前，在这个时期中，书内收录的内容该是最多的一部。

二、从1912年4月临时大总统解职起，至1913年12月止，记录了演说一百零二次，与人谈话四十四次，答访员（记者）二十七次。1912年8月24日至9月17日，孙中山在北京期间，与袁世凯共谈话十三次，各书漏载者多，本书全载，并有历次谈话内容。

三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，由南京移驻上海，九个月中，多次自上海出发，分别访问了武汉、福州、广州、香港、澳门、香山（翠亨村故居）、烟台、天津、北京、张家口、太原、阳泉、石家庄、唐山、山海关、济南、青岛、江阴、镇江、九江、南昌、安庆、芜湖、杭州、松江等地，是孙中山一生中巡访国内省区最多的一段时间。本书记录了所至各地的活动，以及游览名胜的有关情景。

四、记录的范围，从政治、社交到家庭以至个人的服饰、爱好，细大不捐，均有反映。读者可以从中窥见孙中山在这一阶段内的全部内容。

这本书不仅记录的范围广，散见于各种记载的一言一行均爬梳录入，而且力求其客观、真实，凡属重要事件，常常引用多种记载，互相补充；凡发现时间上的差异及其他疑误，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记述，作了不少订正，给人以信赖感。

在这一阶段中，孙中山的主张和思想，多具体地体现于组织共和国政府及其颁布的各项法令。各书均有详略不等的论述，大家的认识比较一致。但有两个问题有必要在这里提出来：一、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，主要是出于“天下为公”的民主思想还是迫于形势？前不久，孙道临同志为写孙中山电影剧

本，也曾问及这个问题。二、孙中山在辞临时大总统后，移居上海和巡防各地的演说、谈话，有几十次畅谈社会主义，比他先前所谈的社会主义远为丰富，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究应怎样评价和理解。我以为这些问题正有待于进一步探讨。本书对这两个问题都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和线索。

就前一个问题来说，孙中山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，由美洲经欧洲回来，未入国门于1911年11月16日致电《民立报》说：

“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，欣慰。总统自当推定黎君。闻黎有请推袁之说，合宜亦善。总之，随宜推定，但求早巩固国基。”对总统人选表示了超脱的态度。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的次日，袁世凯竟悻悻然来电责问，孙中山立即发出义正词严的复电，互以“孙逸仙君”“袁慰庭君”相称，彼此大有不愉之色，揭示了孙袁矛盾的信息。情况的发展迫使孙中山迅速由对清朝的斗争转为对袁世凯的斗争，而对袁斗争远比对清斗争复杂。孙中山和黄兴是有功成不必由我的气度，屡说只要赞成共和而又有威望与魄力能统一中国，谁当总统都可以。孙中山到北京与袁世凯接触后，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，甚至为之解说，“绝无可疑”，电促黄兴速去北京会谈，并说“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”。然而孙中山对袁世凯确不那么信任，曾多方谋求给以约束。由于那时“非袁莫属”的声浪不仅喧嚣于立宪官僚和外国公使、领事，而且在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，南方涣散无可恃。这个形势，孙中山不去位已很难，所以他自我慰藉地说：“维持现状，我不如袁；规划将来，袁不如我。”本书引录的另一段记载也耐人寻味，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莅福州，各界举行欢迎会，会场匾额署“中国一人”，联为：“有天下而不与；微斯人谁与归！”表示了对孙中山的

极大崇敬。“有天下而不与”一语，既惋惜孙中山的去位，也道出了孙中山自己的心情。

后一个问题，在孙中山许多有关社会主义的言论中，1912年10月14日至16日《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》长篇，概述了他此时对社会主义的全部认识。其中说到各种名目的社会主义时指出：“厥后有德国麦克司（马克思）者出，苦心孤诣，研究资本问题，垂三十年之久，著为《资本论》一书，发阐真理，不遗余力，而无条理之学说，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。研究社会主义者，咸知所本，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。”并说在众多的社会主义学说中，“共产主义本为社会主义之上乘”。本书在节录这篇演说时，增录了《天铎报》的报导，说当日“会场秩序，井井有条，与会者不下千六百余人，第二天二千余人。第三天三千余人，会场已无隙地可容。”这种盛况，固然有许多人是出于对孙中山的仰慕而来，却也有是被社会主义的新奇所吸引。本书又据《民立报》录了演说的开场白，其中说：“鄙人读社会党党纲（指那时的中国社会党党纲），似于社会主义之精髓有所未尽，此由社会主义精奥复杂，非但我国人未窥底蕴，即欧美人亦多不了了。”从以上言论来看，比孙中山早先谈的社会主义大大地丰满了，他谈到了马克思，谈到了《资本论》，谈到了共产主义是“社会主义之上乘”。虽然，他仍有许多附会之词，也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和达到社会主义之路，但他对社会主义是十分向往的。据此，可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，就是在他们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当初，也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永恒的社会，憧憬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前头还另有个美好的世界。后来，孙中山赞成十月革命，接受中国共产党和

苏俄的帮助，提出三大政策，并不是突然的转变，而是上述认识在新形势下的发展。因此，我以为把孙中山晚年的光辉思想称作“伟大的转变”，还不如称作“伟大的发展”比较贴切。

我以优先阅读书稿的机会，感到王耿雄同志这本书的问世，对进一步研究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大有益处，对今年孙中山逝世六十周年、明年孙中山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也是最好的纪念。

1985年3月陈旭麓于上海

编辑凡例

一、本书所收孙中山史事自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始，至一九一三年“二次革命”失败止。

二、本书史事按年月日顺序，逐条纪事，均注明材料根据，以重史实。

三、所叙史实，尽可能以孙中山著作、演讲、谈话、函电、公牍以及史事活动为依据，其中孙中山行谊见于他人著述者，略加考订，亦予以注明。

四、本书史事，主要引自报刊资料，并尽可能用两种以上材料，可相互补充核对。凡有重要的歧异、勘误处，则加注说明。

五、在本书时间内，凡孙中山言论、文章为《孙中山全集》或《国父全集》等未载者，本书概行收录，并注明出处。

六、所叙史事除根据记载进行摘录，其中或据原意作少量文字改动均不加引号；凡孙中山言论、著作、函电及他人有关著述者，均标以引号者，均照录原文。凡编者所作说明，均以按语形式出现。

七、纪年以公历为主，附以清代年号和民国年份及岁次干支，一九一一年的月、日附纪阴历。

八、纪事详其月日，无日可稽者附于同月之后，几条纪事日期相同，第一条注明月日，余则均标以△号。

九、对史料难以辨认的字用□代替，对疑误字或错别字用〔 〕更正，对缺字以二种刊物互校用〈 〉增补。在卷末附录本书征引书目。

目 录

1911年10月	(1)
11月	(19)
12月	(52)
1912年 1 月	(86)
2 月	(149)
3 月	(207)
4 月	(253)
5 月	(301)
6 月	(317)
7 月	(330)
8 月	(336)
9 月	(383)
10月	(437)
11月	(473)
12月	(484)
1913年 1 月	(506)
2 月	(516)
3 月	(539)

4 月	(576)
5 月	(588)
6 月	(593)
7 月	(599)
8 月	(609)
9 月	(626)
10月	(627)
11月	(629)
12月	(632)
附录：征引书目	(634)
后记	(645)

1911年(清宣统三年 辛亥)

十 月

10月10日（八月十九日）在孙中山革命旗帜影响下，武昌起义爆发。

昨日晨，武汉革命党人讨论起义办法，上午十时，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机关部制造炸弹失慎爆炸，孙武受伤，避入医院就医。正午俄巡捕掩至，捕党人刘同、王炳楚等，尽得党人所遗文书、名册、符号、旗帜。消息传至武昌，蒋翊武乃于下午五时二十分，在小朝街机关部，以临时总指挥名义，下达作战命令。由南湖炮队鸣炮为号，定于当晚十二时发动。惟以清方戒备森严，传令者杨宏胜被缚，届时未能起义。而清军警破门入，复捕刘复基、彭楚藩等，新军中党人，人人自危。本日晨八时，清湖广总督瑞澂杀党人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于督署门外东偏墙隅，临刑大呼“孙中山及未死同志，万岁！万岁！”闻者堕泪。

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宏胜三烈士就义后，武昌特别戒严，人心恐怖，谣言蜂起，清吏复破获革命机关多处，党人被迫，乃决定提前发难。时党人孙武因伤移居汉口共和里，刘公走避

长清里，蒋翊武出奔京山，汉口武昌隔江相望，声息不能相通。而瑞澂所委武昌知府陈树屏，会同习练公所总办铁忠及各司道，继续会审昨日所捕革命党人，分别取供，直至午后三时始毕，俱发交监候。于是瑞澂尽悉革命党计划，乃按所获名册，分派军警围搜雄楚楼十号刘公、杨玉如处，巡道岭九号同兴学社邓玉麟处，胭脂巷十一号胡祖舜处，党人又被捕数十人。祸机迫于眉睫，于是新军中炮兵工程诸营党人，以义无反顾，乃决计起义。

晚七时左右，武昌驻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首先发难，占领楚望台，推举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，进攻湖广总督衙门。

熊秉坤率工程第八营同志进攻楚望台军械库时，步兵十五协二十九标蔡济民、三十标方维等亦率队来会。乃派金兆龙赴南湖迎炮队，附近马队同志亦举枪相应，乃相继入城，协力进攻督署。

当时武昌城内共有新军二十二营强，除五营已内应为革命军外，尚有十七营之多，苟瑞澂、张彪略事镇静，则革命军前途艰难尚多。而瑞澂、张彪弃城逃走，革命军遂得顺利光复武昌。

（《中华民国史事纪要》（1911年）第626—645

页，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3年版）

10月11日（八月二十日）武昌光复，革命军推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出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。黎初不肯接受，后勉强出任。

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，闻所部辎工两营响应革命，曾令炮队往攻，炮队亦不稳。及蛇山炮声起，左右请黎走避，乃偕其参谋刘文吉，管带谢国超，走避黄土坡刘文吉寓，在刘

寓易便衣，转避谢国超宅，时约上午三时左右。

先是革命发动前曾举刘公为都督，刘英副之。及武昌光复，刘公在汉口避匿未出，刘英远在京山，各军将校以资望浅，不相上下。天将曙，众乃围集楚望台坡下，吴兆麟与蔡济民等会商，派人分途邀请各同志，及城中资望重的耆绅父老，于上午十时集合谘议局会商办法。省议员刘赓藻曰：“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，若合选当导觅之。”众赞成，蔡济民乃率少数同志偕刘赓藻往寻黎元洪。黎至，乃相拥至谘议局。时中午十二时，值谘议局议长汤化龙、副议长张国溶、议员刘赓藻、胡瑞麟，秘书石俨及党人张振武、李翊东、王文锦、方定国等先已被邀在局，乃至会议厅会议。公推汤化龙主席、会议期间，李翊东持一预写之“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安民布告”请黎签字，元洪畏缩颤声曰：“毋害我！毋害我！”时有同志持枪向黎氏示威者，蔡济民、陈磊急护之，翊东乃援笔代书一黎字，众鼓掌称善，乃将布告贴出。

（居党生：《辛亥札记》第49页）

△ 在旅途中译读黄兴密电，得悉武昌新军必动。

“武昌起义之次夕，予适行抵美国哥罗拉多省之典华城。十余日前，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，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，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，故途上无由译之。是夕抵埠，乃由行李检出密码，而译克强之电。其文曰：‘居正从武昌到港，报告新军必动，请速汇款应急’等语。时予在典华，思无法可得款，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，惟时已入夜，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，思虑纷乱乃止。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，再详思审度而后覆之。”

（《孙中山选集》上卷第183页）

按：典华：即丹佛（Denver）。

10月12日（八月二十一日）从美国报纸欣悉武昌起义消息。

“午前十一时，起而觉饥，先至饭堂用膳，道经迴廊报馆，便购一报携入饭堂阅看。坐下一展报纸，则见电报一段曰：‘武昌为革命党占领。’如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，已为之冰释矣。乃拟电致克强，申说复电延迟之由，及予以后之行踪。遂起程赴美东。时予本可由太平洋潜回，则二十余日可到上海，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，乃以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，不在疆场之上，而在樽俎之间，所得效力为更大也。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，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。……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：美、法二国，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；德、俄二国，则当反对革命者也；日本则民间表同情，而其政府反对者也；英国则民间同情，而其政府未定者也。是故吾之外交关键，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，厥为英国，倘英国右我，则日本不能为患矣。予于是乃起程赴纽约，觅船渡英，道过圣路易城时，购报读之，则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，拟建共和国体，其首任总统，当属之孙逸仙云云。予得此报，于途中格外慎密，避却一切报馆访员，盖恶虚声而图实际也。”

（《孙中山选集》上卷第183—184页）

△ 汉口、汉阳光复，革命军推詹大悲为汉口军政分府主任，何海鸣副之。李亚东为汉阳知府。

晨六时武昌电线已恢复，革命军以黎元洪名义通电全国，告以武昌光复，请即响应。并电上海促居正、黄兴、宋教仁来鄂，并请转电孙文从速回国，主持大计。